

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演变

王梦迪 吴越 刘智耿

2017年3月22日

1 简介

2 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观念

中华民族形成很早，但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，中国人持“华夷之辨”，以文化而非血缘传统来判定一个人的归属。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让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与此同时，西方的科学、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，其中就包括西方民族主义，这促进了中国本土民族主义的发展，而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导致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，将中华民族凝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，向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进行转变。

2.1 梁启超

梁启超是最早引进西方民族主义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和使用“中华民族”这一观念的人。1901年，梁启超发表了在《中国史叙论》一文。梁启超在文中称，“吾人所最惭愧者。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。寻常通称。或曰诸夏。或曰汉人。或曰唐人。皆朝名也。外人所称。或曰震旦。或曰支那。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。”可见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明确地对自己的民族进行定义，只是模糊地进行代称。文中提出了“中国民族”这一说法，将中华民族这一传统上的文化观念视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。文中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：“第一，上世史，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，是为中国之中国，即中国民族自发达、自竞争、自团结之时代也”；“第二，中世史，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，是为亚洲之中国，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、繁赜、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”；“第三，近世史，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，是为世界之中国，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、竞争之时代也”。

1902年，梁启超在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中，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提出：“齐，海国也。上古时代，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。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：一曰国家观，二曰世界观。”在该文中，梁启超对“中华”的内涵做了说明：“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，谁乎？我中华也；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，谁乎？我中华也；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，谁乎？我中华也。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，世界莫能及。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，世界莫能及。”

1905年，梁启超在《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》一文中，使用了“中华民族”七次（简称为“华族”），并明确表示：“今之中华民族，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”，它是“我中国主族，即所谓炎黄遗族。”，由此可知梁启超主张中华民族就等于汉族，他将中华民族认定为汉族与其前身华夏族，这与今日的定义，即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。

梁启超为晚清君主立宪的改革派人士代表，反对鼓吹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党政治主张，主张将满清疆域境内各民族视为一个整体来拯救的“大民族主义”。梁启超将革命党政治主张描述成对立的“小民族主义”，认为“小民族主义”鼓吹汉族独立建国，从满清的统治中独立复兴单一民族。

2.2 杨度

继梁启超之后，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早期使用者。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《金铁主义说》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“中华民族”，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“中华”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：“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，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。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，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，而非其民族之名也。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、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，自命其国曰中国，自命其民族曰中华。即此义以求之，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，别于地域，中国云者，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。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，别于文化，中华云者，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。”

杨度主张“汉”只是“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”，应采“中华”为“文化之族名”以反对“汉族”血统说。因此杨度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，但其强调以中国自古以来以“文化较高、人数较多”的历史文化定义和梁启超的政治文化定义有所不同。杨度提倡中华民族为中华文化之族名，将中国全体人民尽成为中华民族。

2.2.1 this is subsubsection

References